

论本维尼斯特的语言符号学体系^{*}

庞茂森

摘要：本维尼斯特立足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思想，提出话语层面的语义学和跨语言分析中的元语义学两条路径，进而构成符义学、语义学和元语义学三种模式。符义学关注语言符号自身的意指性，语言符号在封闭系统内作为交流的基础材料，只有在语言群体中被识别出来才能发挥其意指功能；语义学围绕话语的意指层面，在句子表达形式中揭示语言的交际功能；元语义学针对文本和作品进行跨语言分析，作者创造出适合再现情感的意象，使自己的独特体验内在于话语。这两条路径和三种模式，构成了本维尼斯特符号学思想的主要脉络，并且对后续符号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本维尼斯特，语言符号学，符号学，语义学，元语义学

On Benveniste's System of Linguistic Semiotics

Pang Maosen

Abstract: Building on Saussure's foundation of linguistic semiotics, Benveniste proposes two key pathways—semantics at the discourse level and metasemantics in translinguistic analysis, together forming three modes—semiotics, semantics and metasemantics. Semiotics, in this framework, emphas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linguistic signs, which serve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当代法国话语语言学的发展与应用”(24YJC740056)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埃米尔·本维尼斯特符号学思想研究”(Y030232059002041)阶段性成果。

as the fundamental units of communication in a closed system. These signs function as signifiers only when recognized within a language community. Semantics focuses on the level of meaning within discourse, illuminating 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 of language through sentence-level expressions. Metasemantics, on the other hand, provides a translinguistic analysis of texts, where authors craft imagery that captures and conveys their distinct emotional experiences within discourse. These two pathways and three modes constitute the core of Benveniste's semiotic theory, and they have exerte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subsequent semiotics research.

Keywords: Benveniste, linguistic semiotics, semiotics, semantics, metasemantics

DOI: 10.13760/b.cnki.sam.202501015

引 言

埃米尔·本维尼斯特 (Émile Benveniste, 1902—1976) 是法国当代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哈佛大学语言学教授沃特金斯和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托多罗夫称他为“二十世纪法国最伟大的语言学家”(Watkins, 1984, p. 3; Benveniste, 2012, p. 195)。同时, 本维尼斯特也是国际符号学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曾任巴黎符号学学会的第一任主席, 极大地推动了符号学在法国的发展。我国学者张智庭就表示, 本维尼斯特的开拓性研究构建了符号学的基础理论, 是巴黎符号学学派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怀宇, 2016, p. 22)。严格来说, 本维尼斯特关于符号学的直接论述仅有一篇, 即国际符号学协会刊物 *Semiotica* 的开篇之作《语言符号学》。在这篇奠基性文章中, 本氏只是提出了符号学研究的展望方向, 对于具体的理论框架并未做进一步阐释。不过, 纵观他的全部研究成果, 我们可以发现, 本维尼斯特的符号学思想总是与他对语言的思考密不可分。建立一门语言符号学, 占据了本氏后期学术研究的核心地位, 是他对自己学术思想的总结和升华。因此, 我们立足于语言和跨语言两个层面, 尝试从符号学、语义学和元语义学三种模式出发, 大致勾勒出本维尼斯特的语言符号学理论, 以期对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语言符号学的思想突破

本维尼斯特的符号学思想首先建立在对现代符号学两大先驱的审视和反

思之上。他认为，皮尔斯的庞大逻辑结构将符号概念湮没于无穷的符号世界中，阻碍了符号在各种形式上的具体应用，而万事万物皆为符号的看法，把宇宙世界纳入了同一个符号系统，无异于否认符号和符号系统的存在（本维尼斯特，2008，pp. 115 - 116）。作为法国语言学巨擘梅耶的得意门生，本维尼斯特对同门师祖索绪尔的符号观更为赞同。他几乎全盘承袭了索绪尔关于符号的差异性、系统性以及二元性的认识，接受符号存在且只能存在于符号系统内的观点，认同以语言学模式为范型考察符号学问题，“语言符号的研究可看作句段（syntagme）的研究，而其他符号系统的研究则被看作范例（paradigme）的研究”（张新木，2013，p. 120）。在法兰西学院担任“普通语言学”课程的讲席教授时，本氏曾在1968—1969年专门讲授符号学，逐一讨论了符号和符号系统的基本成分、分析单位、类型划分、组合规则、意指方式、运作模式等问题。如果说这些符号学基础的“加固”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索绪尔学说的延续与发展，那么本维尼斯特在语言研究中引入主体活动和陈述行为，则呈现出与索氏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径，甚至可以说，本维尼斯特是把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当作反例来构想他的语言符号学的。

“主体”历来处于结构语言学和形式语言学的边缘地位，甚至遭到绝对排斥。本维尼斯特（2008，pp. 293 - 294）却强调言语活动与言说主体的密切关系，率先从哲学角度剖析语言的主体性问题：“人在语言中并通过语言自立为主体。因为，实际上，唯有语言在其作为存在的现实中，奠定了‘自我’的概念。……言说的‘自我’即存在的‘自我’。”不同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原则，在本氏这里，主体性不再是人的内在本质属性，而构成了语言的基本特性，用王论跃的话说，是“我言故我在”（本维尼斯特，2008，p. 358）。并非人先天地具有主体性，而是语言使主体性成为可能，语言的使用使主体性得以确立。因而，人通过语言成为主体，构建现实存在的自我。本氏的这种主体观不仅契合欧洲大陆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潮——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人存在于语言中，同时也与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主体理论不谋而合——“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不仅人讲话，而是在人身上，通过人，话在讲，他的本质变成由语言的结构显示其中的效果所构成，他成了语言结构的素质，由此而在他身上回响着言语的关系”（拉康，2001，p. 591）。由于语言“使每个说话者都能在自称为我的同时将全部语言占为己有”（本维尼斯特，2008，p. 296），本氏将说话人进行主体建构的这一过程表述为“陈述活动”（énonciation），即“通过个体使用行为实现的语言的实际运用”，也就是“说话者依自身需要发动语言的事实”（本维尼斯特，2008，

p. 159)。人称代词、动词时态、时空指示词、模态、语式等语言的特定形式便构成以“话语时位”(instance de discours)为中心的一整套参照机制,支配着陈述行为的实现情境。

本维尼斯特关于“主体性”和“陈述活动”的论述深刻地反映了语言与世界、语言与实践、语言与言语的交互作用,打破了索绪尔和其他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只研究系统内部结构而不考虑语言外部因素,只关注形式使用而不重视语言使用的局面,为言语活动的研究重新找回了平衡。当然,索绪尔本人并没有忽视言说主体,也不否认言语的研究价值,只是他将这类范畴看作纯粹的个人创造或个人产物,断定无法对其进行科学化和理论化的建构。格雷玛斯(2011, p. 114)曾提及本维尼斯特对索绪尔思想的发展,“我们把第一次将陈述活动表述为索绪尔语言概念中‘话语建立’阶段的功劳归于本维尼斯特”。我们还会看到,本维尼斯特的上述研究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撕掉了索绪尔为符号学贴上的“心理学”标签,并重新赋予符号学“文化学”的色彩,而且还推动了话语研究的框架搭建,促进意指系统研究的原则确立。事实上,本维尼斯特的思想“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成为巴黎符号学学派对于‘文本’或‘行动中的话语’进行分析的重要理论参照”(张智庭, 2015a, p. 11),并且在后来的主体符号学、话语符号学、激情符号学、张力符号学等领域中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二、语言符号学的两条路径

本维尼斯特创建语言符号学的直接动因在于解决索绪尔符号学的内在矛盾。他申明,索绪尔的符号学受到其工具本身,也就是符号的阻碍,“排除语言符号的概念,就势必取消了语言最重要的特性;而把符号扩展为整个话语,就不得不与符号是最小单位这一定义背道而驰”(本维尼斯特, 2008, p. 140)。符号与单位之别让本维尼斯特(2008, p. 197)意识到有必要区分言语活动的两个不同领域,“有了句子我们就离开了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的领域,而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进入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的世界,其表达方式就是话语”。本氏对“语言”与“话语”的划分最早见于他应拉康之邀发表的《精神分析与语言的功能》,旨在说明语言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发挥的媒介作用:“精神分析学家进行治疗的依据就是病人这个主体对他说的话,他通过病人对他说的话来观察病人,通过病人的语言行为(‘虚构’行为)来研究病人”,而“主体利用言语和话语来做自我‘描述’,他想怎样看自己就怎

样看自己，他能让‘他人’怎样看他就让‘他人’怎样看他”（本维尼斯特，2008，p. 98，p. 100）。由此可见，精神分析是关于语言，确切地说，关于话语的分析。“病人”这个主体是由话语建构的，而话语又是在语言的内部并通过语言来实现的，因此“主体置身于话语和语言之间的矛盾之中”（本维尼斯特，2008，p. 101）。1966年，在第十三届法语哲学大会的报告《言语活动中的形式与意义》中，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1974，p. 224）进一步将“语言”与“话语”阐释为语言的两种存在方式：“作为符号学（sémiotique）的语言”和“作为语义学（sémantique）的语言”。1969年的《语言符号学》又继续表明“符号学”和“语义学”分别是语言在形式结构和交流运转中进行意指的方式：“符号学”是“语言符号特有的并将语言符号组成单位的意指方式”，而“语义学”是“话语生成的特定的意指方式”（本维尼斯特，2008，pp. 138 - 139）。

本维尼斯特（2008，p. 139）特别注意到，语言之外的系统都只能在单一维度上具有意指性。比如，交通信号灯、礼仪手势等是符号的，没有语义性，而绘画、雕塑、舞蹈等艺术表现是语义的，没有符号性。语言是唯一一个能够同时在“语言”和“话语”两个层面上依次实现意指性的系统，本氏称这种双重符号性为“双重意指性”（la double signifiante）。正是语言的这种独特意指方式使它成为符号功能的典型表达、最佳的符号组织，使它能够言说一切、阐释一切。既然语言对一切符号系统，包括它自身，进行分类和诠释，那么，语言与一切符号系统都处于一种解释性关系中，即解释系统与被解释系统的关系。这一推论让本氏断言，“任何非语言系统的符号学都必须借助语言媒介，因此只有通过语言符号学、并在语言符号学之中才能存在”（本维尼斯特，2008，p. 134）。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再次得到论证，精神分析学家对“无意识语言”的阐释无法脱离语言的象征机制而存在。“只有在实现为句子的话语中，语言才得以形成、才得以成形。言语活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用一句拉丁成语说，那就是：nihil est in lingua quod non prius fuerit in oratione（语言中的一切无不首先存在于话语之中）。”（本维尼斯特，2008，p. 198）。

“话语”这个概念并不陌生，在传统修辞学中，它可以是任何形式的语言成品，人的全部所说所写。但在语言学和符号学领域，我们常将这一现象的初始研究与本维尼斯特联系在一起。正如法国学者德宋（Dessons，2006，p. 16）所评论的：本氏不仅制定了陈述概念，还“创造”了话语概念，以全新的方式重新定义了它的特殊性质。基于语言所提供的形式配置，话语一方

面关系着说话人、陈述、语境、言语行为等主体间交流的所有问题，另一方面连接着篇章或文本等更高层面语言单位的意义生成，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意指实践。张智庭（2015b，p. 185）认为，话语“还可以构成‘行动中的话语’，即它可以与‘话语’之外的‘语言外现象’联系在一起，是一种‘无限的’符号学实践过程”。虽然本维尼斯特在《印欧语体制机构词汇》中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这些词汇的深层意义，揭示出作为潜在结构的体制机构，但他还未把话语完全引申至具体的社会存在形态，几乎不关涉权力、性别、意识形态等要素。尽管如此，他聚焦个体的言语事件，阐明语言的符号化能力，使语言能够在三个层面上经受意指分析：“语言的优势在于同时包容了符号的意指性和陈述的意指性。由此产生了它的强大力量，即建构第二层陈述的力量。在这一层面上，对意指性进行意指阐述成为可能。正是在这一元语言能力里，我们找到了使语言能包揽其他系统的解释性关系的起因。”（本维尼斯特，2008，p. 139）以此为准则，为了突破索绪尔符号系统的局限性，本维尼斯特（2008，p. 141）提出两条路径：一是“在语言内的分析中，开辟一个新的意指层面，即话语的层面，我们称之为语义学”，以此与符号层面的符义学区分开来；二是“在对文本和作品的跨语言分析中，构建一门元语义学，它将建立在陈述语义学的基础之上”。

三、语言符号学的三级模式

在本维尼斯特看来，符号学和语义学需要一套各自独立的概念系统，诗歌语言也同样要求不同的定义机制和一门“不同的语言学”。因此，我们认为本维尼斯特的语言符号学在语言内部以符号学为基础探讨语义学，扩展到其他语言中则衍生为文本和作品的元语义学，构成一个三级模式（见表1）。

表1 语言符号学的三级模式

范围	符号学模式	语言单位	语言功能	认知机能	参考理论
跨语言	元语义学	图符	示意	感知	诗学/篇章语言学
语言内	语义学	词	交际	理解	陈述语言学
	符号学	符号	意指	识别	系统语言学

（一）符号学模式

符号学以符号为单位，归属于符号学的一切都能在语言内部和语言使用

中被识别出来。每个符号都在与其他符号的对立关系网络中存在，由其他符号在语言内部对其进行限定，并且“从符号本身来看，它对于自身是纯粹的同一性，对于任何他者是纯粹的相异性”（本维尼斯特，2008，pp. 138 - 139）。综归起来，符号学具有三大原则：第一，不涉及符号与指涉物、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第二，只有统称价值和概念价值，没有特殊所指和偶然所指；第三，呈现二元对立性，按照聚合关系排列（Benveniste, 1974, p. 223）。

在能指层面上，“符号学研究就在于识别各个单位，描述其区别性标志，并找出越来越精确的区别标准”（本维尼斯特，2008，p. 138）。简单地说，就是找出能指的形式结构。比如，本氏划分出三类形式成分：符号词素（sémio-lexème），即自由词汇符号；符号范畴素（sémio-catégorème），即类别亚符号，比如前缀、后缀等，它使能指的所有类别相互衔接，确保独立单位可以构成更大的单位；符号音位（sémio-phonème），即具有一定功能的音位（Benveniste, 1974, p. 222）。在所指层面上，符号学分析在于确定符号是否意指，是否存在于一门语言中。只要一个符号存在，那么它必定被接受并且以某种方式与其他符号相关联。只有语言共同体里的使用者才能理解这门语言，因为符号“在每个成员身上唤起的，大体上是相同的联想和对应关系”（本维尼斯特，2008，p. 139）。本氏（本维尼斯特，2008，p. 140）曾明确表示，“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理论将为我们所说的符号学提供研究基础”（本维尼斯特，2008，p. 140）。就此看来，符号学在系统内部展开，不考虑一切个人的和情境的因素，基本沿用了索绪尔意义上的“语言”理论，笔者在此不予赘述。

（二）语义学模式

语义学关涉使用中和行动中的语言，执行语言的交际功能，所以语义学的最佳表达形式是句子。句子总是特殊的，关联语言之外的事物，指涉话语的情境和言说者的态度。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 1974, p. 225）同样概括出语义学的三条基准：第一，意义通过语段并在语段的形式中完成；第二，就形式结构而言，语义学的单位是词，它是信息的最小单位，也是思维进行编码的必要单位；第三，句子的意义是它所表达的思想（idée），总是伴随着话语时位的“我－此地－此刻”。语义学上的形式分析在于将陈述连续分解至语义单位——词。因为，词借助一定的形式进行组合排列（agencement syntagmatique），从而实现句子的意义，而句子的意义则是“通过整体的理解而感知到的全部思想”（Benveniste, 1974, p. 228）。言说者由思想出发，将

词组合成句，词被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在句中，从而获得个别的、特殊的、情境的概念。但是，“句子的‘指涉’是产生句子的事物状态，即句子涉及的话语或事件情境，我们永远无法预知和猜测”（Benveniste, 1974, p. 226）。因此，每次说出的句子都是一个不同的事件，是一个转瞬即逝的事件，它只存在于句子被说出的那一刻，随即消失。

语义学是本维尼斯特生前构想的最为完善的一部分，莫里斯划分的三大符号学分支——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都融汇在这一模式中。从上可知，语义学是面向世界的、开放的，符号学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正如本氏所言，“事实上，符号的世界是封闭的。无论通过组合化还是其他方式，都无法从符号过渡到句子。在它们之间有一道相隔的间隙”（本维尼斯特，2008，p. 140）。本维尼斯特将“语言”与“话语”之间的差别推向了极致，言语活动的两个组成部分成为完全对立的内外两面。这种内外对立的二元视角构成了本氏进行语言分析的主要方法。他说，“真正的问题”在于“要寻找出我们平常只注意其外在表象的那些现象的内在结构，并且要描写出该深层结构与所有外显现象之间的关系”（本维尼斯特，2008，p. 82）。不过，在笔记手稿中，本维尼斯特又写道，“陈述构建话语的世界”，实现“语言”到“话语”的个体转化（Dessons, 2006, p. 16）。由此可见，本氏在符号和语义之间架起“陈述”这道桥梁，以完成从符号到词、从所指到用法的转换。“语言”与“话语”二元对立体重新统一在符号学的框架下，并且涵盖了主体、社会、指称物等所有被置于语言系统之外的现实。这既是本维尼斯特符号学思想的矛盾之处，也是其张力所在。因为本氏不仅把从“传统”语言学分离出的构成成分置于两极位置，而且将它们囊括在一个统摄一切外部现实的超验统一体中。这种分离再统一的方式实际上否定了“主体和语言的构成性划分（division constitutive）”（Normand, 1989, p. 164），否定了语言研究中被普遍接受并加以应用的这一理论原则。

此外，本氏一方面将符号学视为封闭的内部语言学，另一方面却赋予其强大的整合能力，使其能够包含一切外部现实，甚至延伸到整个社会文化层面。他认为，“一个语言单位的意义具有整合到一个更高层次单位的能力”（本维尼斯特，2008，p. 193），因此符号构成词的“整合成分”（intégrant），融入句子之中。论及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时，本维尼斯特（2008，p. 57）指出，人类关系处于语言与文化之间，其关键在于，这是一种行动、改造、接受的能力，是一种必然整合的关系。他在表述语言与其他系统之间的符号关系时使用的也是“符号关系”（rapport sémiotique）一词（Benveniste, 1974，

p. 54)。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整合关系和符号关系都是“解释关系”（*relation d'interprétance*）的一种变体，符号、语言、符义都发挥着“整合项”和“解释项”的作用。虽然本维尼斯特意在建立一门广义符号学（*sémiologie*），但他关注的重点似乎仍然是其内部对象，即他所说的符号学。并且，严格意义上说，这里的符号和语言应是狭义的符码或代码。但正是这种封闭与开放的纠葛提供了符号与句子、语言与文化融合的空间，确保语言能够在其内部以及与其他符号系统进行整合。因为符号学强大的涵摄能力归根结底来自语言的意指机制和符号的意指功能。

总而言之，本维尼斯特试图通过符号学来解决“语言的语义化”（*sémantisation de la langue*）问题，在符号学与语义学之间虚构了一条分界线。语言将外部世界占为己有（*approprié*），不仅是人类适应和调节的过程，也是意义建构和生成的过程。这样的符号学理论在符号同一性与句子多样性、语言离散性与话语连续性的对立统一中获得勃勃生机和创造力，开启了意指活动的无限性，尤其在本氏的元语义学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由于本氏认为只有符号学中的意指单位才是真正的符号，所以如若将符号学视为“狭义符号学”，语义学视为“准符号学”（周忆宁，1985，p. 11），符号学和语义学构成新的符号，进入第二层叙述和话语的层面，即元语义学领域。

（三）元语义学模式

本维尼斯特关于元语义学的论述不多，学界通常认为笔记《波德莱尔》手稿是他构建元语义学的初步尝试。这份笔记“与其说是研究波德莱尔，不如说是借由波德莱尔的作品研究诗歌语言（艺术）”（Dessons, 2015, p. 191）。元语义学模式不是把文本看成一份数据材料，进行结构主义式的描述和拆解。诗歌总是一个“个别的人”的产物，糅合着诗人自身的所思所感。因此，如同语义学聚焦“产生陈述单位的行为本身，而非陈述的文本”（本维尼斯特，2008，p. 159），元语义学也需关注言说主体的活动，“要同时研究一首诗歌及其诗人，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Benveniste, 2011, p. 188）。另外，诗歌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它传递的不是概念、信息和思想，而是情感：“在日常语言中，词语意指思想；在诗歌语言中，词语图示情感。”（Benveniste, 2011, p. 134）本维尼斯特把图符（*icône*）视为诗歌语言的基本单位，区分作为图符的词语和作为符号的词语。图符永远是个人的、独一无二的，而符号是人所共有的、概念性的。所谓“诗歌交际”（*communication poétique*），就是诗人把自己对世界的独特体验转置成话语，从而在读者身上

激发出同样的情感。只要能让读者体会到情感,词语和句子的选择和组合都可以无关其语义功能。诗歌中的词语同时进行“示意”(évoquer)和“意指”(signifier),它们“既是符号,也是图符”(Benveniste, 2011, p. 602)。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一种等级关系,比起词语的内在意义,这种转置更加在乎词语的图示能力(pouvoir iconique)。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 2011, p. 688)甚至把诗歌语言直接称为“图符语言”,点明“诗歌的问题,就是把词语从符号的概念状态转变成图符的当前状态”。

诗人以语言为原材料,把词语组合成适于再现情感的意象,意象示意客体,将客体置于当下的存在中,从而激起读者对事物的独特体验,可以说,“诗人使人观看和感觉”(Benveniste, 2011, p. 738)。诗歌语言的示意层面关涉的不是日常语言概念下的现实,而是“现实的诗歌视角”(Benveniste, 2011, p. 138),即诗人对现实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的和个人的体验成为诗歌的指涉,内在于诗歌的表达。诗人用自己的独特方式将词语组织成诗歌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个人的、瞬间的现实,这一“现实”密码既由诗歌的表达编制,也因诗歌的表达而得到逐步揭示。诗人一方面告知我们关于他的事实(vérité),从而展现关于我们自己的事实;另一方面又经由话语创造,向我们揭示出遮蔽在规约或习惯之下的现实(réalité)。正如本氏所述:诗人使用某种“反语言”(contre-langue)组成各种感官意象,造就一个“超世界”(ultra-monde)或者“反世界”(contre-monde)的诗歌世界(Benveniste, 2011, p. 566)。在此,我们已经可以粗略窥见符号学与语义学共同进入语篇层面,展现为一种在意义之上建立意义的元语义学形态。巴尔特(2008, p. 69)曾证明,“以人类语言提供的第一系统为基础的社会,将不断发展出一些第二意义系统”。一个系统可以整合到另外一个系统中,以至于意义可以无限生成。

“元语义学”顾名思义,即以语义学为对象的语义学。“元”,指“语言的解释活动和视角的发现”(Laplangue, 2011, p. 14),它们通过话语中的创造得以实现。如前所示,语言的元语言功能本质上是一种不断进行阐释的功能。这种再阐释其实就是一种再创造,就如同“一生中每天都向别人说‘你好’,每一次都是一次再创造”(本维尼斯特, 2008, p. 50)。但诗歌并不遵守语言的规约原则,它是一个“个别的、私人的世界”,一个“全新的、特殊的宇宙”(Benveniste, 2011, p. 130)。艺术作品亦是如此。它构成一个封闭世界,其意指性由艺术家赋予,并且只能在作品内部得到表达,依赖于各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不过,这种封闭性也只是相对的。诗人自由地对词进

行新的组合，重新建立了一门“新的符号学”，而读者－听众面对的却是一种摆脱了话语基本规约的语言，他不得不强迫自己适应、学习这门独一无二的语言，并且重建该诗的规则和意义。在语言活动中，重复即创造，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新的陈述，一次新的主体化，一次新的生产。本氏曾引用兰波的名言“我是另一个”来说明“我”“可能是无数个主体——或者谁都不是”（本维尼斯特，2008，p. 250）。“我”与话语的双向关系就发生在陈述的过程中：一方面，肉体的“我”与言说主体、庸常的“我”与创作主体分离；另一方面，说话人与听话人、作者与读者之间建立主体间性。在这个意义上，诗歌与行动也密不可分，“诗歌语言，更确切地说，诗学不在于‘说’（dire），而在于‘做’（faire）”（Benveniste，2011，p. 400）。“言说，总是言说某物”（本维尼斯特，2008，p. 136），主体与实在并不直接相连，而是由语言缔结一种中介关系。同样，创作者“我”与“我所言之物”通过“另一个”建立联系，这“另一个”就是语言。诗人和艺术家善用符号的功能，建立他们自己的“符号学”，而作品则言之有物，那么语言解释的对象正是这所言的“语义学”。毕竟，任何符号系统都要经过语言媒介的重构；语言既建构主体，又再生产现实。不难看出，本维尼斯特阐述的“作品”不仅是艺术和文学的性质，也是语言理论本身对符号的批判。这种意义生成机制跨越语言与艺术之间的界限，表现出充分的辩证性和动态性，而话语作为意义生成的动力深卷其中，“说话的人通过他的话语使事件以及他对事件的体验重生，听他说的人首先把握到话语，并且通过话语，把握到被重新生产的事件”（本维尼斯特，2008，pp. 11 - 12）。

结 语

以上分析证明，本维尼斯特在语言符号学方面的思考，两条路径和三种模式的建议，确实具有相当的理论高度和系统性，对后续的符号学研究起到了引领作用。从符号到话语或语篇的语言内分析，再到文本和作品的跨语言分析，本维尼斯特“超越索绪尔那种以符号为基础的语言学或符号学，转入对话语层面的研究；与此同时，在话语研究的基础上，进而研究文学的话语，而从文学话语研究中得到的成果亦可能有助于对其他艺术符号的研究”（龚兆华，2016，p. 56）。他围绕“语言中的人”，以及在话语中被不断重构的现实，试图在语言内部寻找意义的组织方式和生产机制，并借助语言本身来颠覆语言的传统意指，进而深刻地揭示出意义生成的动态性、开放性和无限性。

□ 符号与传媒 (30)

总之, 这样一门语言符号学之所以成为可能, 正是因为语言的阐释性、中介性和创造性都来自它的意指活动。“一个符号的无限衍义, 最后可能延及整个文化”(赵毅衡, 2011, p. 108), 本维尼斯特(2008, p. 73)有理由说, “意指层面使所有的人文科学联为一体”。

引用文献:

- 巴尔特, 罗兰(2008). 符号学原理(李幼蒸,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本维尼斯特, 埃米尔(2008). 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王东亮, 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本维尼斯特, 埃米尔(2014). 语言的结构与社会的结构(朱江月, 译). 当代修辞学, 4, 51-56.
- 格雷玛斯, 库尔蒂斯(2011). 符号学: 言语活动理论的系统思考词典(怀宇, 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 龚兆华(2016). 本维尼斯特论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之别. 当代修辞学, 6, 50-60.
- 怀宇(2016). 论法国符号学.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 拉康(2001). 拉康选集(褚孝泉,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 张新木(2013). 论索绪尔对符号学发展的贡献. 俄罗斯文艺, 4, 118-123.
- 张智庭(2015a). 巴黎符号学学派的语言学基础. 语言学研究, 2, 5-16.
- 张智庭(2015b). 巴黎符号学学派的产生与发展. 符号与传媒, 2, 180-188.
- 赵毅衡(2011).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周忆宁(1985). 班威尼斯特对发展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所作的贡献. 现代外语, 3, 6-12.
- Benveniste, É. (1966).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I*. Paris: Gallimard.
- Benveniste, É. (1974).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II*. Paris: Gallimard.
- Benveniste, É. (2011). *Baudelaire*. Limoges: Lambert-Lucas.
- Benveniste, É. (2012). *Dernières Leçons: Collège de France 1968 et 1969*. Paris: Seuil, Gallimard.
- Dessons, G. (2006). *Émile Benveniste. L'invention du Discours*. Paris: Éditions In Press.
- Dessons, G. (2015). D'Étranges Contrées du Langage. Benveniste et L'Aventure du Baudelaire. In Sandrine Bédouret-Larraburu & Chloé Laplantine (Eds.), *Émile Benveniste. Vers une Poétique Générale*, 191-201. Pau: PUPPA.
- Laplantine, C. (2011). *Émile Benveniste, l'Inconscient et le Poème*. Limoges: Éditions Lambert-Lucas.
- Normand, C. (1989). Constitution de la sémiologie chez Benveniste, *Histoire Épistémologie Langage*, 11 (2), 141-169.

Watkins, C. (1984). L'Apport d'Émile Benveniste à la Grammaire Comparée. In Guy Serbat, Jean Taillardat & Gilbert Lazard (Eds.), *É. Benveniste Aujourd'hui.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u CNRS*, 3 – 11. Paris : Éditions Peeters.

作者简介：

庞茂森，博士，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符号学、法语语言学。

Author:

Pang Maosen, Ph. D. , lecturer of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r research fields are French semiotics and French linguistics.

Email: vivipang29@163.com